

对联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民族文化艺术表现形式。近日，中国首位对联学硕士、湖南省楹联学会副主席鲁晓川作客国学讲座，通过讲述对联的对仗骈俪美、平仄和谐美体现中国的语言魅力，通过描绘对联清正和雅的气象、通达涵容的韵度展现文学的特点——

对联，写出来的中国气派

■文/本报记者 许珂 图/本报记者 周国



鲁晓川

一上一下自成乾坤，一字一句清正和雅。

对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千百年来，一直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所欣赏。它一般是用古典艺术语言造句和修辞，具有典雅、精炼、优美的特点。2005年，中国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中国首位对联学硕士、湖南省楹联学会副主席鲁晓川作客国学讲座，通过讲述对联的对仗骈俪美、平仄和谐美等，向大家展示了对联里的中国气派。

对联起源于桃符，推广普及得益于朱元璋

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春联，起源于桃符（周代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后汉书·礼仪志》所载，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降鬼大神“神荼”“郁垒”的名字。“正月一日，造桃符着户，名仙木，百鬼所畏。”所以，清代《燕京时岁记》上记载：“春联者，即桃符也。”五代十国时，宫廷里，有人在桃符上题写联语。

《宋史·蜀世家》说：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木板，“以其非工，自命题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便是中国的第一副春联。直到宋代，春联仍称“桃符”。宋代，桃符由桃木板改为纸张，叫“春贴纸”和“春联”。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据说，五代时的后蜀国国君孟昶是个喜欢标新立异的国君，在公

元964年岁尾的除夕，他突发奇想，让他手下的一个叫辛寅逊的学士，在桃木板上写了两句话，作为桃符挂在他的住室的门框上。这两句话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第一句的大意是：新年享受着先代的遗泽。第二句的大意是：佳节预示着春意常在。

由此开始，桃符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这不仅表现在开始用骈体联语来替代“神荼”“郁垒”，而且还扩展了桃符的内涵，不只是避邪驱灾，还增加了祈福、祝愿的内容。这就成了中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到了宋代，在桃木板上写对联，已经相当普遍了。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反映了每到除夕之日，家家户户挂桃符（即今春联）的盛况。同时，随着门神的出现和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来书写桃符，以往的桃符所肩负的驱邪避灾的使命逐渐转移给门神，而桃符的内容则演化成用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降临和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

“春联”一词的出现，则是在明代初年。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喜欢排场热闹，也喜欢大户人家每到除夕贴的桃符，就想推广一下。在当年的除夕前，他颁布御旨，要求金陵的家家户户都要用红纸写成的春联贴在门框上，来迎接新春。正月初一的早晨，朱元璋微服巡视，挨家挨户察看春联。每当见到写得好的春联，他就非常高兴，赞不绝口。

一次巡视，朱元璋见到一家没有贴春联，就询问什么原因，侍从回答说：“这是一家人从事杀猪和劊猪营生

的师傅，过年特别忙，还没有来得及请人书写。”朱元璋就命人拿来笔墨纸砚，为这家书写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写完后就继续巡视。

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巡视完毕返回宫廷时，又路过这里，见到这个屠户家还没有贴上他写的春联，就问是怎么回事。这家主人很恭敬地回答道：“这副春联是皇上亲自书写的，我们高悬在中堂，要每天焚香供奉。”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就命令侍从赏给这家三十两银子。

由此可见，“春联”的得名和推广，是朱元璋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颁布御旨才得以在家家户户推广开来的。

朱元璋还亲自撰写，赐给近臣，如给学士陶安的对联：“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倒也对仗工整，平仄谐和。春联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开始流行于世。

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和艺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种类繁多，如“门心、横批、框对、斗斤、春条”等等，门心贴在门板上方中心部位，横批贴在门楣上的横木中间，框对则用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春条有很多种，如“开门见山”“抬头见喜”等等不一而足。千家万户在小年后张贴，新春气息浓郁明显，如清代民俗名著《燕京岁时记》曾描述：“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或用朱箋，或用红纸。”那时候，贴对联已经深入千家万户，成为百姓迎新辞旧不可或缺民俗了。

对仗骈俪美、平仄和谐美，成就对联的中国气派

对联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这样描述过对联，“对仗者，独体文字之所特具，亦即国学精神所寓也。”

那么，何为对仗呢？对仗是中古时诗歌格律的表现之一。诗词中要求严格的对偶，称为对仗。对仗主要包括词语的互为对仗和句式的互为对仗两个方面，对仗多用于骈文。

对仗又称对仗、排偶。它是把同类或对立概念的词语放在相对应的位置上使之出现相互映衬的状态，使语句更具韵味，增加词语表现力。对仗有如公府仪仗，两两相对。对仗与汉魏时代的骈偶文句密切相关，可以说是由骈偶发展而成的，对仗本身应该也是一种骈偶。

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又如，两鬓霜，一客行。新绿衬酒红。七颗星，一袍风。尧舜对苍生。弯月对长虹。我对你，嘴对心……

由此可见，对仗是对联文体的格律基础。对联，也就是独立使用的对仗句子。它具有字类相当、词性相对、意境相合、节奏和谐四大特点。

作为对联，至少要讲究对仗，动

词对动词，名词对名词，数词对数词；其次要讲究平仄，平对仄，仄对平，仄起平收，“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三连平、孤平这些作诗的大忌一定要避免；再次要讲究点意境和韵味，太过直露的一般是下品。

对联的要求十分严格，比起律诗来要求还要严格，强调对句的字形、字音、字义，都要两两相对，整齐优美。所谓“字字相对”“平仄互对”“词性相对”是也。

如，巧对数字联。有人游览桂林独秀峰，在凉亭休息，指着这个六角亭对同伴出了个一联：“独角尖尖，四面八方六角”，其中有一游客对了下联：“两拳拱拱，五指二短三长”，对得也较工整自然。

佛印巧对苏小妹。佛印与苏东坡交谈常常得意忘形，苏小妹有意讽刺一下这个和尚，便出个上联：“人曾是僧人弗能成佛”，佛印想了想便对道：“女卑为婢女又可称奴”，苏东坡连声叫好，真是出得好，对得也针锋相对。

当代工人们对清代名联。成都望江楼有幅上联：望江楼下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百余年来竟无人能对，一九六四年在望江楼举办的赛诗会上有一青年工人对了下联：赛诗台上赛诗才，诗会绝世，诗才绝世。若不计较平仄要求，对得算是巧妙了。

巧改对联。有一贪官，时时标榜清廉，他在家门口贴了副对联：爱民若子，执法如山。有一聪明的百姓便在上下联各添一句，改为：爱民若子，金子银子皆吾子也；执法如山，钱山靠山岂为山乎。这一改，真是还其贪官污吏真面目。

贪墨生情，完成旧对。朱元璋当牧童时常到学堂去听课，特别喜欢老师教学生对对子，时间久了，老师也喜欢上这个放牛郎。这老师临死前交了一幅上联给朱元璋说，这个上联我写了十多年了，下联还对不上。你想想看能给我对上。这上联是：“三土考老着”。朱元璋好久也未对上。后来当上皇帝，在一次寿宴上见五个孩子都来拜寿，想起这五个皇子都喜爱弹奏，不禁触景生情，大呼妙妙妙，把老师交给的对联对上：“五王弄琵琶。”

上联中秋写，下联年关对。中秋赏月，一秀才出个上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不管秀才们如何的苦思冥想都对不上，直到年关时，一秀才对上了：“今夜年尾，明日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这对得浅显明快，真是一巧对也。

王羲之防盗联。某年大年夜，羲之写了幅春联：春风春雨春色，新年新岁新景。不想刚贴出不久便被人家揭走了，再写：莺啼北里，燕语南邻。贴出后还是让人揭走了。羲之想了想，贴出了这样一幅对联：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果然没有敢揭了，到春节黎明，羲之便续上，变为：“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日行”。街邻见了，无不称妙。

养民的政治主张，《资治通鉴》赞扬“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薛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这首《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柳宗元贬谪柳州后创作并寄与刘禹锡等四位共患难的朋友的一首七律，充分抒发了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人的深厚情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同科进士，同朝为官，又共同参加“永贞革新”，成为推动唐代中期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后来又同样遭遇两次被贬流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患难之时见真情。元和十年时，柳宗元贬岭南柳州刺史，刘禹锡贬更偏远的古夜郎国播州刺史。柳宗元感叹说：“播非人所居，而梦得（刘禹锡）亲在堂，吾不忍其穷，无辞以白其大人在，如不往，便为母子永诀。”即草章奏，欲以柳州授刘禹锡而自住播州。逝世前，柳宗元留书给刘禹锡托付后事：“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刘禹锡执书以泣，将他遗留下来的著作编成《柳河东集》，并亲自作序，凝结成了两位监察御史的正气之歌。（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刘良璧：

政通人和，治行称最

刘良璧（1684—1764年），字省斋，清湖南清泉县（今衡南县廖田乡）人。刘良璧“有干济才而持躬廉洁”。雍正三年（1725年），他任连江县令，六七月间，全县“淫雨不止，溪涨泛滥”。次年夏秋季节，干旱、洪水、大风一灾接着二灾，刘良璧深入灾区巡视，了解民众疾苦捐米赈粥，不待朝廷批准，先拨付赈灾银两，同时申奏朝廷免税银，还发放救济粮 3000 多石，深得百姓爱戴。

乾隆三年（1738年），刘良璧因为政绩卓著，晋升为台湾知府，乾隆五年（1740年），擢升分巡台湾道。当时，台湾孤悬海外，民生凋敝，人心动荡，危机四伏。刘良璧受命于危难之际，“公正明决，案无留牍”“抚以恩威，结以信义”。在台湾本地一些大族中挑选道德高尚而有威望的人为族正，优礼相待，并设立“义学”，延聘名师任教。仅数年之后，械斗之风渐渐平息。

有一年，台湾、凤山两县发生大灾，波及“田园”1.4万亩，他奏请豁免税租

用典释义

亲民之吏与民一体

亲民之吏，分当与民一体，况吾辈佐吏为治，身亦民乎！尝见幕友，位置过高，居然以官体自处。齿鲜衣轻，渐不知民间疾苦。一事到手，不免任意高下。

——《佐治药言》（清·汪辉祖）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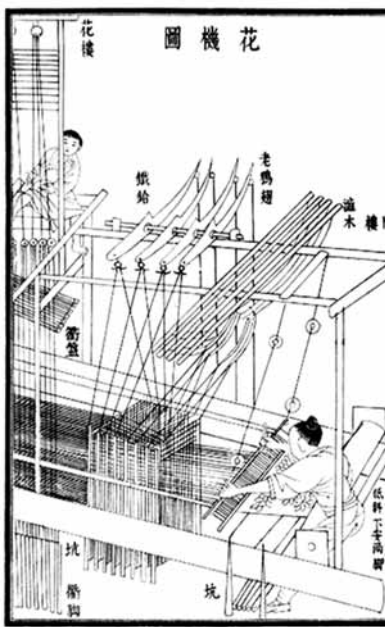
爱护老百姓的官吏，和老百姓应是一家人。更何况我们这些辅佐治理政务的人，本身就是老百姓啊！曾经见到过这样一些幕友，觉得自己地位较高，居然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官。吃香喝辣，穿丝戴绸，渐渐忘记了民间疾苦。在办事的时候，就不免忘乎所以，随心所欲地处理。

■解读

这段文字选自清代名幕汪辉祖所著《佐治药言》，乃嘉官贤臣之道，清官良吏之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汪辉祖不仅是一位难得的清官，更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好官。1787年，他出任湖南宁远知县，百姓因淮盐昂贵而私下食用粤盐。由于买卖粤盐违反禁令，官府派人侦捕，以致“人情惶忧”。汪辉祖得知

国学教育

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八 提花机



《天工开物》中的花机图

提花机是能够贮存提花信息的织机。凡有花纹的纺织品在织造时，将提花信息用各种安装在织机上的提花装置贮存起来，以便得这种记忆的开口信息得到循环使用。这就如同今天计算机的程序，编好这套程序之后，所有的运作都可以重复进行。在提花机出现之前，织物上的花纹要通过挑花来完成。挑花的方法有两种：挑一织织一纬，或者挑一个循环织一个循环。无论哪种方法，挑花的信息都无法长期贮存并反复利用，这样即使在织造重复花纹时也需要重新挑花，费时费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古人摸索出两条途径，由此而走向提花技术。一是将挑花杆“软”化，即用综线来代替挑花杆，这样演变成为多

3.5万余石和白银900余两。为“兴贤育才”，他还捐出自己的俸禄，倡修几度兴废的海东书院，并为之订立学规六条；“明大义、端学则、务实学、崇经史、正文体、慎交游。”他之后又报经闽、浙总督策楞批准，修纂《台湾府志》，于乾隆七年（1742年）正式刊出。刘良璧为官数十年，令行禁止，“台人畏而敬之”。福建布政使张嗣昌称赞他的政绩为“吏于台，率属供职，政通人和，治行称最”。

乾隆二十一年（1755年），刘良璧告老还乡，“足不至公府”，以教育子侄读书和从事农桑活动为乐，过着清贫的生活。乾隆二十八年（1742年），《清泉县志》编纂告成时，知县江恂邀请他为县志作序，刘良璧欣然接受。

（记者胡建军根据市志办提供的资料整理）

衡阳历史文化 小辞典 人物系列(28)

后，决心解决百姓的食盐问题。他诚恳听取百姓意见，按需供应粤盐。百姓对此无不拍手称好，但一些人竭力反对，诬告汪辉祖支持贩卖私盐，汪辉祖据理力争，后来湖南总督毕沅知道此事后，对汪辉祖大加赞赏。

清廉为心，公仆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主仆关系不容颠倒》一文指出：“古人也常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勉励领导干部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立身、处世、从政，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领导干部应以民心为己心，把不私心自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从政官德。“为民”是官德的核心，“务实”是官德的基础，“清廉”是官德的内在要求。领导干部要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然做官，就得做一个人民满意的官，做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领导干部把群众的幸福安康放在自己的心上，把严以律己时刻牢记心中，关心群众，心存敬畏，勤于自省，不愧对手中这份权力和责任，不愧对人民的期望和信任。

（本报综合）

国学人物



御史柳宗元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山西永济）人，唐代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黔之驴》《捕蛇者说》等文章家喻户晓，特别是同韩愈一起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复兴儒学，对推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鲜为人知的是，柳宗元还是唐代中期的监察御史、政治家。

正史上讲，柳宗元少时“聪警绝众”，文章“璨若珠贝”，当时人“咸推之”。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21岁的柳宗元与刘禹锡同登进士，十年后又与刘禹锡同任监察御史。柳宗元家族还是历史上著名的门望族，其先祖柳爽曾任中书令（宰相），他的父亲柳镇则辅佐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后任侍御史。柳家可谓满门忠烈，御史世家。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江雪》是柳宗元贬谪永州期间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那么，柳宗元为什么写这首诗，这首诗又反映了他怎样的心境呢？这就要先了解一下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柳宗元生活

在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后形成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的局面。唐顺宗贞元元年（805年），以王伾、王叔文为首的官僚士大夫集团在顺宗支持下推行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他们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打击宦官专权，但终因政治力量不足，革新以失败告终。柳宗元是“二王八司马”中的八司马之一，当时，王叔文“尤奇待宗元”，及得政，提拔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放在身边“与之图事”，并“欲大进用”。革新失败后，柳宗元与刘禹锡等八人一起被贬地方任司马，柳宗元任永州司马。这首诗正是柳宗元在永州期间创作的，是典型的以诗言志，表达了一个政治家不向黑暗势力屈服，决心秉志特立的悲壮气节。

作为政治家，柳宗元在他的《梓人传》中对治国理政提出了宝贵的见解。《资治通鉴》专门择要作了摘录，足见柳宗元政治思想值得后人重视借鉴。文章以“梓人（建筑设计师）”的传奇事迹为喻，通过“梓人之道”阐述治国的大道，提出治理天下应“条其纲纪”“齐其法制”；“择天下之士使称职”；“居天下之人

使其安业”；“不衡能，不矜名”，夸耀自己的才能，自尊自大；“不亲小劳”，去做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不侵众官”，干涉下属分内的工作，而是应专心研究“大者远者”等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正如梓人善于运用众工匠一样，领导者要善于使用好各方面的人才。

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地方官更加紧了对广大农民的盘剥。农民除了向国家交纳正常的捐税外，还要承受地方官吏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可谓“苛政猛于虎”。针对基层官吏繁政扰民的情况，柳宗元写下名篇《种树郭橐驼传》。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载，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说明“为政亦然”的道理，批评当时基层官吏“好烦其令”，主张与民休养生息。他批评“旦暮吏来，聚民而令之”，基层官吏不断催促百姓耕织劳作，表面上好像是怜爱百姓，但百姓反受其害。他借用郭橐驼的口质问，百姓们整天忙于应酬官吏不得空暇，又怎么能繁衍生息，安定民心呢？通过这篇寓言，他对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了顺天